

马新 著

吾服自冠万年，不亦乐乎？

不思人之不知，妻不知也。

若年若人之妻，不别人之妻。

人无是道，我亦近之。

君子不亦不乎，特而不支。

无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解

Lunyujiedu

泰山出版社 ◆



马新 著

论语解读

Lunyüjiedu

泰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解读/马新著. —济南:泰山出版社,
2000. 12
ISBN 7-80634-204-4

I. 论… II. 马… III. 论语-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209 号

论语解读

著者/马新

出版/泰山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日照日报社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6

字数/380 千字

印数/4500 册

版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204-4/Z·37

定价/25.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编:250001 电话:2062166 6073

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孔子

(代序)

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让人彷徨、让人不安、让人奋进的时代,更是一个礼崩乐坏、新旧交替的时代。

我们本书的主人公孔子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风尘仆仆,历尽艰辛,数十年如一日,谱写着人生的强音符,把自己融入了历史,把历史担在了双肩。

中国文明的历史在经历了夏、商两个奴隶制王朝后,到西周时代已是文物鼎盛,礼乐繁华,俨然泱泱大国了。这个建立在三千年前左右的奴隶制王朝有三个突出的制度,可以作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窗口,这就是分封制、宗法制与井田制。我们要了解孔子,首先就要了解孔子的时代,而要了解孔子的时代,又必须从这儿道起。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掉商朝,正式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病死,东方骚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经过三年征战,安定了西周大局,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分封制。所谓分封制,就是把全国大部分土地、人民再划分为一个个大小不一

的邦国,分配给西周王朝的亲属、功臣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西周初年,分封了七十余国,在今山东一带,有齐国、鲁国,还有邹、邾、滕、郕、郚、曹、邢、茅等小国;在今河南一带,有宋、卫、管、蔡、郑、毛、雍、应、凡、蒋、胙、祭、虢仲、虢叔、陈、杞、申、吕等国;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有晋、韩、燕、霍等国;在南方地区,则有吴、楚、申、吕、随等一大批邦国。除了分封的大小邦国外,周王朝还有王室直接控制的地区,称王畿。王畿分宗周、成周两部分:宗周是周人兴起的根据地,以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为中心,包括整个关中平原;成周以东都王城(今河南洛阳)为中心,包括河、洛、伊、瀍一带,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宗周与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其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都遥居各邦国之上,是周王朝控制全国的基地。

所谓宗法制,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在宗法制度上,周天子既是整个王朝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最大的族长,掌握着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历代的天子一般都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或者得到一方独立的封地,建立自己的邦国,成为诸侯;或者在王畿的土地上分到一块土地,称“采邑”,自己则在王室担当一定的职务。周天子永远是天下的宗主、大宗。

分封的邦国称诸侯,诸侯国的国君,也是由嫡长子继承,他们对于周天子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国内则是理所当然的大宗。在诸侯国内,作为嫡长子的国君又把国内的土地人口分配给自己的兄弟亲属,建立采邑,实际上还是小型政权,这批人称为卿大夫。卿大夫以下,还可以分出他们自己的亲属,给予一定的土地,让他们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批人便是士。士以下,是各级宗法结构下那些越来越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是一般平民。

宗法制的核心是按照血缘关系构筑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

格局,确定整个社会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并以此为基点,确立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整个社会都要循规蹈矩,不得越雷池一步。

井田制是西周王朝的经济制度。所谓井田,本是指划分土地的单位。西周时代的良田,大都经过精心整治,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划分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标准的井田。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土地为一百亩,作为一个耕作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由于这一时期的劳动与土地分配的计量单位多是井田,所以,后人便以井田制统指这一时期的经济制度。在井田制下,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民众的最高主宰,他以天下宗主的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民众分封给大小诸侯,诸侯们再将自己封国内的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各卿大夫之家再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各级贵族各自成为所得土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对这些土地世代相承,役使奴隶进行耕作,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的比较稳定的奴隶制经济单位。

在层层相属的这些奴隶制经济单位之外,西周还存在着大量的平民自耕农,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土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他们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服一定的劳役,对宗子存在着一定的依附性。他们也被称为“国人”,或称为“庶人”、“小人”。

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是西周王朝的三大支柱,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分割制度,是一种统治秩序。为了维护这种分割制度和统治秩序,西周王朝还有严密的军事、礼乐与刑罚制度,用于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卿大夫、卿大夫对士的层层控制。

以军事制度为例，西周王朝严格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诸侯国之间不得擅动武力。天子直接指挥的军队有十四师，宗周六师，成周八师，共有十四万甲士，这是周王朝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武力基础。分封的诸侯国也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但大国不过三师（军），小国不过一师，而且，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实际上也属于整个周王朝的武装力量。

正由于此，西周时期，天子对于诸侯有着极大的权威。诸侯国君要定期朝见国王，要定时定制向王室缴纳军赋和贡税。周王可以随时征调各国的军队，被征调的国君要随周王出征。王室要兴建宫室或其他重大工程时，各国要提供劳役。王室的重大祭祀，诸侯国君要亲自前往助祭；对于周王的死丧、嫁娶和出巡，各国也都有特定的义务。如果不遵从王命或违反规定，周王可以削减他们的爵位，另立国君，乃至废除封地。

在这一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相对安靖，井然有序，这也正是我们本书的主人公孔子所向往的时代。

当历史的步履跨进春秋时代的门槛后，一幅全然不同于往昔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的先民面前。在这幅画面中，充满了动荡，充满了战争，充满了呻吟；也充满了竞争，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它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绚丽多彩的画卷之一。

战争与动荡是这幅历史画卷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与动荡中，昔日神圣的周王室失去了它固有的光环，旧体制、旧制度走向了它们的末路，各个诸侯国，各个卿大夫，社会中的每一个势力，每一个集团，每一个人都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它们有的正在沉沦，有的正在上升，有的不甘沉沦，有的正奋力攀援……

周王室以往统治的三大支柱，正在发生着剧烈的裂变。在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中，诸侯国的力量不断壮大，改变着他们与周王室的力量对比；卿大夫的力量不断壮大，改变着他们与诸侯国君的力量对比；与此同时，士、平民、奴隶等社会阶层也都发生着

重大变化,改变着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

西周王朝末期,面临着西北部族的强烈侵扰。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继位后,鉴于镐京被犬戎等攻破后残破难整,又处于其威胁之下,遂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此后直至公元前 476 年,由于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年代大体相当,所以又称作春秋时期。平王东迁后,在戎狄的不断袭扰和诸侯的蚕食下,天子直辖的王畿地盘大大缩小,最后只剩下洛阳周围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只相当于一个小诸侯国。自然,周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成为一个徒具虚名的天下“共主”。这时,一些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日益强大起来的诸侯国,都在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弱肉强食,不断发动兼并战争,出现了列国相争、大国争霸的动荡局面。

最先称霸的是齐国的齐桓公。齐桓公在公元前 685 年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积极进行改革,富国强兵,使其国力日益强盛,连续灭掉了谭、遂等小国,又率齐、鲁、宋、陈、卫、曹、郑、许八国军队讨伐南方的楚国,几次召会诸侯,发号施令。齐桓公去世后,齐国霸业衰落。楚国在相继灭掉了玄、黄、徐一批小诸侯国后,势力扩展在今豫南、皖北地区,公元前 638 年又在泓水之战中击败宋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都相继弃齐附楚。

在南方楚国势力不断强大之时,北方的晋国在晋文公的统治下,势力也不断膨胀。公元前 632 年,与楚国爆发了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使中原小国摆脱了楚的控制,归附了晋国。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大会诸侯,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霸主。这年冬天,晋文公又在温(今河南温县)召会了齐、秦、宋、鲁、郑、陈、蔡、莒等诸侯,周天子也被召赴会。

与晋国称霸的同时,关中的秦国逐渐强大。公元前 627 年,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之机,企图插足中原,派军偷袭郑国,与晋爆发了崤之战,全军覆没。秦国东进受阻,遂致力西方,“益国十

二,开地千里”,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

南方的楚国虽然在与晋国的角逐中暂居下风,但它一直积蓄力量,觊觎中原,仍想与晋一争雌雄。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又率军北上,问鼎中原,嗣后,又相继攻克郑都,降服宋国,并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鲁、宋、郑、陈等中原小国又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一时成了中原霸主。

晋楚相争,断断续续持续了百余年。连年的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双方也感到精疲力尽,与此同时,各国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战乱纷纷的中土大地,出现了“弭兵”活动。

6

“弭”就是消除,“弭兵”,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就是“和平”。公元前579年,由宋国执政华元发起,邀请晋、楚两大国在宋订立了互不使用武力、互相救助,共同讨伐违命反抗的诸侯的盟约。订约之后仅三年,楚国就撕毁盟约,与晋发生了鄢陵之战、湛阪之战,但都失败了。公元前546年,宋国的卿大夫向戌奔走于晋楚之间,终于在宋都举行了有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弭兵大会。

此后数十年中,中原大战减少了,齐、晋、鲁等国内部却内乱不断,势力强大的卿大夫们纷纷向自己的国君夺权争利,社会依然是动荡不安。

鲁国内部的相争是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卿大夫与鲁国国君的相争。这三家卿大夫都十分注重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与国君争夺劳动人口,势力逐渐强大。到公元前562年,鲁国的三军被这三家瓜而分之,三家都在自己的辖区征税敛贡,自行其是,国君的费用只能靠三家和一些旧贵族纳贡维持。鲁国国君名存实亡。

齐国的内争是田氏代齐。田氏是陈国的公子完,因本国内乱,逃到齐国,被任命为工正,成为卿大夫,后势力逐渐扩展,成

为齐国的实际执政者之一。公元前 532 年,田氏联合国人向另两家执政贵族栾氏、高氏发动进攻,把他们赶出齐国;公元前 489 年,田氏又率兵冲入国君宫室,打败了齐国的国氏、高氏、弦氏、晏氏四大家族;公元前 481 年,任左相的田常以武力战胜了受齐简公宠信的右相监止,监止随齐简公出逃,两人都被捉回杀掉。不久,“齐国之政皆归田常”。

晋国的内争更为剧烈,先是新兴的卿大夫韩、赵、魏、智伯、中行、范氏与国君及另一批旧式卿大夫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晋国国君名存实亡,六家新贵完全控制了形势。接着,六家新贵之间又战争迭起,公元前 493 年,范氏、中行氏与郑、齐、鲁、卫等国联合,与韩、赵、魏在铁(今河南濮阳西北)发生战斗,范氏、中行氏大败,韩、赵、魏三家又联合将矛头指向智伯,三家分晋的局面已成必然。

不独鲁、齐、晋三国如此,在当时的其他各国中,也是内争不断,战乱迭起。

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分合的年代里,一个新兴的阶层——“士”悄然而起,从王廷卿府到市井社里,无不活跃着士的身影,从谋士、国士、游说之士、辩士、秀士到武士、剑士、高士、隐士、死士、侠士、商贾之士、方士、车士等等,应有尽有。这时的士已大不同于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格局下完全凝滞的那个社会阶层,它几乎是自由身份的同义词,他们可能一夜之间转致卿相,也可能奔走之中“三致千金”。春秋时代剧烈的政治经济变革为他们的活跃提供了有利条件,各国的争斗与对峙又为他们提供了宽阔的活动舞台与空间。

国君卿大夫们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优势,纷纷养士、招士、礼贤下士,身怀智谋技能的士则奔走列国求名干禄。他们纷纷以自己的一智之虑、一技之长,参政、干政,谋求声名富贵,其中的杰出人物则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世界,改变

历史,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孔子是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一位。

二

孔子生活的时代我们已叙述如上,但愿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背景图案。按照人物传记的常规写法,现在我们该步入正题,从头道来了。

从哪儿道起呢?当然是姓甚名甚,何处人氏,生于何年。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氏,祖籍宋国,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但孔子究竟生于哪一年,却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孔子生于何年?孔子本人和他的三千弟子们都无人说过。最早给孔子立传的西汉时代的史学大师司马迁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这个结论载于《史记·孔子世家》;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另外两部阐释《春秋》的著作——《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就这一年之差,两千多年来不知打了多少笔墨官司,从经学大师到莘莘学子,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生命与岁月。至于孔子又生于何月何日,则歧义更多,争执更烈,众多学人皓首穷此,不得真情誓不休,临终也难以瞑目,真可以与抱憾看不到月球背面的伽里略相媲美。

历史终于演进到了20世纪,谙于经学的新派学问家钱穆先生做了一篇《孔子生年考》的文章,大概是有感于两千年来的不了官司,在考订孔子生年之余,对此事本身大大感叹了一番。他说:“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轻重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证不厌其详”,是“劳而且拙”^①。这是足以让人击节赞叹的不刊之论。既然如此,在我们这受限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孔子生年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的叙论中,也就没必要再去辨证、考订一番,我们只须取一种言之有据的说法便可以了。

对孔子生年的取舍如此,对孔子生平中的其他类似问题我们也取同样原则。

下面我们真的可以言归正传了。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地点是鲁国昌平乡的陬邑。陬邑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的一方小小的采邑。刚才我们说到孔子是曲阜人氏,祖籍宋国,怎么又冒出来个陬邑?这三个地点的关系说清了,孔子一家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当周武王伐纣灭商时,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抬着棺材到军前投降。周公旦平定东方,实行大分封时,便将商朝故都商丘一带封给了微子,国号为宋,成了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若由此说起,微子启应当是孔子的远祖。

微子启的第五代传人弗父何本是长兄,应当继承国位,但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让给了弟弟鲋祀^①,是为厉公,厉公允诺弗父何一系世世为宋国大夫。世为宋大夫,只是指嫡系一支,非嫡系的旁枝疏叶则不会有此殊遇。弗父何生宋文周,宋文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由于从弗父何算起,到孔父嘉已满五代,作为支系,应当另立姓氏,所以,从此以后,其子孙就以孔为姓了。

孔父嘉供职于宋廷,在一次宫廷斗争中被华氏家族的华督所杀,从此,华氏与孔氏结怨。到孔父嘉之孙孔防叔时,不堪华氏的逼迫,举家逃到了与宋国相邻的鲁国,定居于陬。

^① 据胡仔《孔子编年》考辨:宋纘公死后,宋传位长子弗父何,而是由纘公之弟杨公廪继位,弗父何之弟鲋祀杀杨公,想拥立弗父何,弗父何不肯接受,鲋祀遂立,即宋厉公。

孔防叔逃到了鲁国后，自然失去了原来在宋国的身份与地位，可能只取得了士的资格。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是孔子的父亲。

孔氏的情况到了叔梁纥时略有转机。叔梁纥身高力壮，勇力过人，曾立过几次战功。鲁襄公十年（前 563 年），第一次弭兵之会十三年后，晋国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军，仍充当着中原霸主的角色。这一年四月，晋国突发奇想，想攻下鲁国南面的小国偃阳，送给宋国大夫向戌，叔梁纥作为鲁国的武士也参与了这次攻城。诸侯们的甲士攻城之际，偃阳人突然打开了城门，甲士们纷纷涌入城内，这时，城门上吊起的悬门被突然放下，眼看进入城内的甲士要被关在城中，叔梁纥奋力向前，双臂托起悬门，使攻入城内的甲士迅速退出，鲁国的贵族孟献子赞叹他是“《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①。经过一番苦战，偃阳被攻了下来，但向戌不领情，不肯接受，请求晋国把此地给了宋平公。宋平公大喜过望，乃超乎常规，动用殷商时天子所用的《桑林》之乐招待晋侯。这一战役，使叔梁纥成了晋、宋、鲁诸国中小有名气的一位武士。

叔梁纥尽管手擎悬门，立下战功，但并未得到重用，到鲁襄公十七年（前 556 年）时，他仍是一员武士，驻守在鲁国的北疆要塞——防邑。这年秋天，齐军分两路进犯鲁国北邻，一路包围了桃，另一路齐军由高厚率领包围了防邑。鲁大夫臧纥及其弟臧畴、臧贾以及叔梁纥都被困在城中。鲁国的援兵到达防邑附近的旅松后，慑于齐军强大，不敢接近。叔梁纥与臧畴、臧贾率甲士三百人，利用夜晚，冲出了齐军包围圈，将臧纥送到了旅松，他们又再度冲破齐军，回到防邑坚守。齐军攻城不下，只好退兵。

这次战功大概也未给叔梁纥带来什么好运，此时的叔梁纥已六十有余，不适宜再在疆场奔波了，估计在这次战役不久，他

^① 《左传·襄公十年》。

就回到了家乡陬邑。

叔梁纥在孔子出生前,已娶妻施氏,生有九女,另外,他娶的一位妾还生有一个跛足儿子,名叫伯尼(又名孟皮)。在鲁襄公二十二年,他与颜氏女结合,生下了孔子,这一年叔梁纥已六十七岁左右。关于孔子的出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只记有十分简短的两句话:“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古人所云“野合”,从字面理解,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婚姻关系之外的男女结合,这种现象在春秋时代还不像后世那样被视为十分非礼;另一种解释是不合礼仪的婚配。古来的经学家们多取后一种解释。理由是《孔子家语》曾说叔梁纥晚年求婚于颜氏徵在,颜徵在遵从父命与叔梁纥结为夫妻。“野合”就是指“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谓不合礼仪”^①。而且孔子在《论语》中说过“野哉,由也”,这儿的“野”也是指不合礼仪,那么,司马迁所云“野合”中的“野”也就应当是指不合礼仪。

“祷于尼丘得孔子”,所谓祷,是指祈祷、祷告;尼丘,即尼丘山,又名尼山,在今曲阜市东南。向尼山山神祷告求子,表明叔梁纥与颜氏求子心切?或是表明他们未能应时而孕?还是表明了其他什么?我们已不得而知。孔子的字中的“尼”字,当与此有关。

根据晋朝干宝《三日纪》的记载,孔子并未出生在陬邑叔梁纥的家宅中,而是出生在“空桑之地”。这个空桑之地晋时又叫空窠,在鲁国南山的山谷中,平常没有水,但若祭祀祷告,则有清泉自石门涌出,足以供人使用,祭祀停止,则泉水枯竭。

干宝的这段记载是最早的有关孔子出生地点的记载,是否

① 《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

出于民间传闻？已不得而知。

孔子出生后，“首上圩顶”，也就是说他的脑袋像倒过来的屋宇一样，中间低而四周高，所以取名为丘。

孔子三岁左右，父亲叔梁纥病逝，母亲颜氏带着他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从此，开始了他“贫且贱”的早年生活。

大约在孔子十六七岁时，母亲颜氏又撒手人寰，少年孔子孤身一人面对社会，开始了自己的奋斗生涯。

孔子曾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自己“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岁以前的孔子生平，史料记载多语焉不详，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其他有关史料，我们可以对三十岁以前的孔子得出这样两点印象。

12

第一点印象是孔子虽然在自己出生前很久就已家道中衰，而且幼年丧父，过着“贫且贱”的生活。但不甘现状，奋力拼争，力图跻身贵族行列是他的一贯心愿。“十五而志于学”，学的目的当然是“学而优则仕”。遗憾的是他试图跻身贵族社会的第一次尝试便被当头棒喝。

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在孔子的母亲去世不久。某日，鲁国的季孙氏大宴诸士，季孙氏与孟孙氏、叔孙氏都是鲁桓公之子的后裔，史称“三桓”。早在孔子出生前，这三家贵族已控制了鲁国的实际权力，其中尤以季孙氏权力最大，在孔子十四岁左右时，也就是公元前537年，三桓将鲁国的三军改编为二军，季孙氏独掌一军，叔孙、孟孙氏合掌一军，实现了“四分公室”。在这场“四分公室”的行动中，季孙氏独得其二。现在既然是季孙氏大宴群士，孔子尽管母丧不久，身着孝服，还是想参与其中。谁料，却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羞辱了一番，阳虎呵斥道：“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①孔子只好退下。

^① 《史记·孔子世家》。

这对于一个刚刚丧母、又汲汲于跻身士这一行列的少年孔子来说,不管当头一棒。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孔子实现自己既定目标的恒心。他二十多岁时,终于在季氏家族内做了委吏、乘田等小吏,负责管理仓库和牛羊。做得兢兢业业,十分认真。他在做良吏时说:要我管仓库,我就要把仓库里的账目算得清清楚楚。他在做乘田时说:要我管牛羊,我就要让牛羊茁壮生长。实际上,孔子做到了这一点。司马迁说他管仓库做到了“料量平”,管牛羊做到了“畜蕃息”^①。

不过,在孔子早年,仕途的大门一直未能向他打开。

第二点印象是孔子的好学与求知欲都远过常人。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是人们熟知的故事。在当时的曲阜,礼教文化氛围十分浓重,是全国的礼教文化中心之一。鲁国是西周开国元老周公旦的封地,其长子伯禽当年就国时,带来了许多典章文物,而且,就礼乐制度而言,鲁国既有诸侯以下所使用的礼乐制度,又有天子的礼乐制度,因为周王朝规定,在祭祀鲁国的开国者周公时,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制度,这是其他诸侯国所不具备的。

礼教文化氛围固然十分重要,但孔子的学业主要还是靠自己坚韧不拔的求知欲和顽强主动的好学精神。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学校教育,也没人开门授徒,礼教文化的学习,主要是依靠平日的耳濡目染,实际环境的训练。这对子贵族社会的成员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但对于孔子来说,却要靠自己去寻找机会,寻找条件,去寻找知识。

《论语》中记载的一件小事,很典型地说明了孔子所独有的学习精神。《论语·八佾》记道:“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陋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有

① 《史记·孔子世家》。

了一个进入太庙的机会，对孔子来说是很难得的，所以，他逢事必问，不计较别人的议论。

《左传·昭公十七年》还记载了孔子向郑子学习的一件轶事，也足以反映孔子的学习精神。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郑国的国君郑子来朝见鲁昭公。在鲁国招待郑子的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起少昊时代职官的情况，因为郑国是少昊的传人，所以郑子很清楚地进行了说明。孔子听到这件事后，立即设法去见郑子，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收获很大。事后，孔子曾感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孔子的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再加上鲁国良好的文化条件，使孔子早年便学有所成，闻名于鲁国。

孔子十七岁时，鲁国大夫孟僖子向他嗣子懿子说了这么一番话：孔丘是圣人的后代，被宋国逼到了我们鲁国。他的祖先弗父何本来可以做宋公，但让给了成公，到他的另一位先人正考父时，先后辅佐了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不但不骄奢，反倒更加谦逊俭朴，还专门在鼎上刻下了这样的箴言：“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僖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①他就是这样谦恭。我听说圣人的后代，即使不当权，也必定是达人。如今孔子年少好礼，难道不是达人吗？我死以后，你们一定要拜他为师。孟僖子死后，孟懿子与南宫敬叔果然到孔子那儿学习礼教。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为妻，次年，生子孔鲤，鲁国国君昭公专门派人送来了鲤鱼。据《孔子家语》讲，孔鲤名鱼，字伯鱼，就是为了纪念国君送鱼一事。作为一个一般武士的后人，能有此殊遇，不能不归之于孔子的个人奋斗，这也表明青年孔子在当时鲁国的声名。

^① 《史记·孔子世家》。